



张志安◎著

记者如何 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 与报道策略

专业

有悲悯之心，但有专业为标在
——著名报告文学家、《中国青年报》原“冰点”副主编卢跃刚访谈

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今天
——《中国青年报》原“冰点”主编李大同访谈

坚守内心忠诚，这是职业化的底色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周末》原主编江艺平访谈

新闻满足我对社会的认知好奇
——新华社主任记者朱玉访谈

在体制边缘做舆论监督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编导曲长缨访谈

我们的意义在于满足知情权
——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主编谈伟访谈

知道的少，就谨慎地活着
——《南方周末》原副总编方捷王访谈

求解案件事实背后的逻辑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编委波亚川访谈

龙灯在身旁，仗剑走天涯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访谈

愿有一种声音把你们唤醒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访谈

逼近真相的过程充满艰辛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访谈

好的职业报道都是调查性
——《环境》杂志主编杨海江访谈

正常的事，这就是职业
——《凤凰周刊》资深记者邵飞访谈

可能之难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青访谈

在记录过程中重建常识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青访谈

追求案件背后隐藏的人性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棱镜对话》资深编导宁宇访谈

在突破中寻找思想资源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瑞访谈

记者的职业精神就是流浪
——《羊城晚报》记者、《新周报》原主编赵世光访谈

每个人心中总有一块净土
——《财经》资深记者何基平访谈

记者不是“独行者”
——《中国新闻周刊》原时政部主任唐建光访谈

我们的生存空间并不是很乐观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11·11》执行制片陆佳访谈

公道不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访谈

服务理想才能找到幸福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志强访谈

回望三十年深度报道实践的历史轨迹
呈现各阶段传媒精英多元的职业意识
描绘转型期新闻生产独特的行业景观

张志安◎著

记者如何专业

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
与报道策略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 张志安著.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80652-696-5

I. 记... II. 张... III. 记者—新闻工作—研究—中国IV. G2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1507 号

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

张志安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3998-8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22.25

字 数：428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启蒙与监督的变奏

——中国深度报道实践轨迹的回望与浅思

张志安

除却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笔者在对数十位深度报道精英的访谈中，还试图描绘出一条深度报道实践变化的大致轨迹。如果不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深度报道”概念在国内的达成广泛共识为起点，而以改革开放初期旧思维、旧体制的告别为社会环境转折的整体拐点，以 1980 年“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报道为业务改革的重要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深度报道实践也已走过近 30 年征程。

倘若参照西方新闻业对记者角色认知“中立”及“参与”的划分，那么，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实践显然更多体现出参与的价值。简略梳理中国深度报道实践的变化轨迹，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启蒙”是 80 年代的关键，“监督”是 90 年代的热点，而新世纪迄今，则在社会控制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的现实中，启蒙式微、监督受挫，伴随对事实原则的捍卫、对专业精神的传播、对揭示真相的诉求，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实践中变得分化与多元。

—

回头看，不过弹指一挥间；细梳理，却是此中有深意。20 世纪 80 年代，以《中国青年报》的业务实践为代表，突破过去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挥洒叙论结合的文体风格、扩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关注改革的方向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发挥激发思辨与社会启蒙的报道功能……在新旧制度的碰撞夹层中，新闻从业者以独特又异类的报道文体呼应了社会对新闻“深度”的需求。

一批代表性作品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的共同景观。1985 年，《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关注新闻的“灰色”地带，1986 年《第五代》开观念式报道的先河，1987 年《大兴安岭的警告》“三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成为灾难报道典范之作，1987 年《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积极推动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同年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又以其反映历史纵深和改革方向的思想容量引起强烈反响。

必须强调，无论文体、思维与功能，这种深度报道的繁荣是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1986年，其被官方的中国新闻奖正式“收编”，以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进行评选，从而完成了从自发实践向权威认同的过渡。

1987年，深度报道达到了其在整个80年代的顶峰，社会发展的意外有时候会以比较突然的方式“追认”历史的辉煌。针对当年深度报道的成就，《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有如是概括：“1987年的深度报道追求表现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成为新闻体现历史意义、追求历史真实的最佳模式之一。同时，以这类手法报道的社会重大题材往往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引起重大反响，体现出新闻参与历史进程的主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中，卢跃刚对当时一批改革人物典型报道的质疑和反思，他通过采访发现《经济日报》的“读者来信”是策划的、年广久在卖霉变瓜子、广关梅成立集团不注册等。这些事实，促使我们在反思中体味：改革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为深度报道实践提供了思想与信源的基础性意义，然而，以改革为绝对价值的报道思维，依然有可能成为遮蔽新闻从业者记录事实、揭示真相的“云翳”。

与当时深度报道实践的盛况相呼应的是，报告文学在整个80年代呈现出空前的热度。伴随文学性报告文学向纪实性报告文学的转变，一批作者、记者以扎实采访、理性思索为基础，拿出了一系列影响至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以《西部在移民》荣居“中国潮”征文奖榜首后，作者麦天枢坦言：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同样作为社会启蒙、文化启蒙的工具，纪实性报告文学与深度报道“殊途同归”，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扮演着相似角色，难怪钱钢这样身兼报告文学作家、新闻记者双重身份的前辈坚定地认为：80年代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归入深度报道的范畴。

二

经历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3年左右短暂的平寂，1992年拉开序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的再度兴起，中国媒体在对大量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逐渐扛起“监督”大旗。

显然，需要被监督的不只是企业，更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步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政府部门的权力滥用、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由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消息源。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在为媒体的“松绑”或“授权”中促使其释放能量，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深度报道呈现出典型的“北央视、南周末”的格局，

而这种格局背后又体现出舆论监督的两种典型模式。

在北京,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开办,标志着电视深度报道改革的勃兴。此后,陆续推出的《焦点访谈》开了电视述评式深度报道的先河,《新闻调查》则不断引领着电视调查式报道的潮流。在一本题为《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书中,孙玉胜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改革以及大量幕后故事。

“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威型监督。无论其实践者是否承认,这种监督本质上都是行政权力监督职能的延伸,是行政系统的“治理技术”。作为国家台和商业台的混合物,《焦点访谈》拥有其他任何媒体所不具有的权威优势、政策资源和行政背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监督呈现出典型特征:监督对象多为市县级地方政府,调查手段多采用“暗访”方式,节目播出后多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和批示,甚至在后续直接的行政干预下解决问题。这个栏目的辉煌可以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的题词为证:“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不是每个舆论监督栏目都有《焦点访谈》的“待遇”,这种监督模式基本不具备复制性,但其体现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路径确是十分典型的特征。在少数省市电视台,一些冠之以“舆论监督”的栏目所监督的同样是更基层的政府,所依托的同样是省市级官员的支持。在本书中,编导曲长缨的访谈中多少透露出这种监督模式的两难困境:既得益于权力,又受制于权力,权利背后的政策变化将直接影响节目本身的监督强度。近年来,《焦点访谈》逐步“无焦点”即是明证,大量“命题作文”“正面报道”让这个节目的监督的“锋芒”日益暗淡,表扬的“光芒”逐渐闪亮。

在广州,《南方周末》的转型与崛起迅速成就了报纸调查报道的“盛世”,同时,也探索出另一种舆论监督的典型模式。如洪兵所言:从90年代中期起,《南方周末》通过提供深入和全面的公共事务报道,尤其调查性报道,从而在更彻底的意义上告别了“真理报模式”,而且集中呈现了20世纪末中国报纸所具有的良好、勇气、水准和创造力。

“南方周末”式的舆论监督是一种自内向外、草根型监督。其监督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一批流浪记者、职业报人的社会责任和良心勇气,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百多万份发行量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力,监督的手段则主要依托揭黑式的调查报道。其典型的监督特征是“主打异地监督,本地监督缺位”,但由于大量触及其他地区的政府脸面、部门利益,经常“惹火上身”,管理部门的治理使得《南方周末》编辑部不得不时常做检讨、适度自我审查甚至撤换主编。

在本书中,李鸿谷、迟宇宙等一些旁观者、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辉煌时期的一些新闻作品和职业意识进行了反思。使用“新闻民粹主义”来进行反思,显然过于苛责,但从信源采集与报道结构处理的失衡、从报道结果对官员与权力部门的刻板呈现看,这种反思不是太多、太过,而是太少、太浅了。

整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以CCTV和《南方周末》为桥头堡,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壮观,其中,值得强调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代表着广播舆论监督的水平,《财经》杂志关于“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的报道制造了专业期刊舆论监督领域的“水门事件”。

时至今日,我们又在新世纪的征途上走过7年。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又在实践中编织着怎样的景观?我们不妨这样大致描绘:

1. 从实践主体看,电视方面,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艰难平衡中继续坚守舆论监督和电视调查传统,央视新闻与法治频道、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如东方卫视的《深度105》、《1/7》)等提供着舆论监督之外大量的深度报道。报刊方面,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主流都市报和以《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代表的新闻类周刊则成为深度报道的主力军。

2. 从力量规制看,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对舆论监督的空间收紧、对异地监督的政策限制使舆论监督类栏目和报刊面临考验和挑战,收视率、发行量等市场利益的功利诉求又迫使很多媒体减少深度报道的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着从业者的心气与管理者的自信。网络媒体尤其是博客、BBS论坛的兴起发挥着“释放”与“支援”的力量:普通公众借助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平台拥有了提供信源的开放管道,传统媒体借助网络媒体的转载和传播大大提升了深度报道的影响力,而针对社会焦点事件网络发挥的广泛传播、汇聚舆论功能更直接强化了深度报道监督功能的实现。

3. 从职业意识看,深度报道从业者们的角色认知、专业理念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在本书的访谈中不难发现,记录或者影响、中立或者参与、监督或者启蒙,不同人对此有不同理解和抉择,而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影响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包括个体、组织、行业与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正因为个体经受这些宏、中、微观层次的影响各不相同,决定着这个群体职业意识的差异。

总体上,这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也是一个缺乏监管标准的新闻界。即便如此,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比普通新闻记者拥有更崇高的职业追求、更强烈的专业意识,高度认同政治民主、市场自由、多元文化等现代社会的价值指标,认真恪守真实、全面、中立的客观报道规范和专业主义原则,能够在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下实现心灵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动态平衡。

殊途而同归,职业意识的差异并不妨碍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思想上彼此交融、精神上相互支援、实践上共同协作。在记录中影响,在监督中启蒙,是当下深度报道作品的独特功能;超越事实,报道真相,是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共同追求。新闻,归根结底是关乎民主的事情,深度报道精英们正以自己的行动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承载着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使命与责任。

导读

这些人，那些事，我们的时代

——30 年深度报道碎片史

在本书中，笔者将访谈重点放在这些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上，花费大量篇幅与被访者探讨新闻的意义、记者的角色、媒体的功能等话题。同时，由于所访对象在不同时期从事深度报道实践，因而，抽出一些他们回忆和表述中的历史瞬间、现场点滴，拼凑出一幅深度报道“碎片史”也别有生趣。

这是一些人的历史，也是一种深度报道的历史。你或许未曾直击现场，但你必然与他们一起亲历和见证着我们共同的年代。相信读这些小故事的同时，也能读出深度报道的苦与乐、社会转型的力与痛。

80 年代

【方进玉】联产承包、生产队长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正广泛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到《瞭望》做记者不久的方进玉，去山东烟台农村采访，却听到一些村民“反对”的声音：我们不要一刀切地搞分户承包，要在集体组织下搞汽车运输队、海滩养殖队、城市建筑队等去挣钱。可是，上级非要分田到户，结果，这个大队的农民造了假：把分田名单交上去，实际上把农田集中起来承包给几位种田能手去种。一位生产队长说：“运动来了，我总是落后分子。”在新华社做新闻很多年，方进玉有时会非常痛苦：“因为你希望能实事求是去报道，但未必能这样。”

【卢跃刚】改革、年广久、关广梅

80 年代后期，《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内部开始反思关于改革人物报道中存在的问题。1988 年开始，卢跃刚陆续采访了年广久、关广梅等典型。1 月份，他发现著名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正在违法，“卖霉变瓜子给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同时，又吃惊地发现，《经济日报》影响深远的“关广梅现象”新闻是制造的，所谓“读者来信”是记者和当地政府制造的，问题的讨论也是制造的。关广梅也不懂法律，成立东明商业集团，却不去工商局注册。卢跃刚问她，

你们为什么不注册？你是不是一个独立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她说：“我们注册干吗啊？市委不是已经开过大会了嘛。”可惜的是，他写的大型报道《“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被枪毙了。“当时，我们就已经觉醒了，不能把改革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尺度……我们要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结果发现改革者违法、改革者走向改革的反面、改革者的价值是颠覆的。”

【方进玉】初级阶段、大梦一觉

1987年，党的十三大即将召开，新华社提前获悉政府将提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方进玉向《瞭望》编辑部领导提出，要写一篇文章叫《大梦一觉30年》，就是说，从1958年开始到1987年，近30年时间，我们做了一个梦：1958年是大跃进，然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到了1987年，我们才发现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共产主义还很远很远。领导同意后，他拿着介绍信去河北、河南采访，地方上把很多档案拿出来，包括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等。回京后，领导嘱咐：太敏感的不要写，其余部分可以写。

90年代

【崔丽】评报栏、旧食堂、大圆桌

1993年，崔丽走进北京东直门海云仓胡同的中国青年报社，感觉编辑部大楼破旧得像个仓库，用的也是竹子筒的圆珠笔，但空气里“好像都充满着一种新闻的气息”。进报社的地方，有个评报栏，贴得花花绿绿，谁都可以在上头写意见。中午吃饭，食堂有个大圆桌最热闹，大伙端着饭盆在那儿神侃。作为小小字辈，她的主要任务是听别人讲。当时，李大同是演讲主角，“说起话来很有感染力，很有张力”。10多年过去了，报社的食堂搬到了新建大厦的二楼，桌子都是规规矩整，4个人面对面坐，吃完饭就走人。旧食堂、大圆桌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曲长缨】砍树、朱镕基、画面

1996年底，CCTV《焦点访谈》编导曲长缨做了一期节目《盗伐危及大动脉》，讲宁夏铁路两边一些树被砍光的事。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说，电视画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看了之后一夜都没睡着觉，之后就下决心要停止砍伐天然林。“其实，朱总理以前看内参，能不知道砍伐森林的事么？肯定是知道的，但没有电视画面对他冲击力这么大。”在这个节目中，曲长缨用了两个镜头作对比：一个是砍光之前绿油油的森林，一个是风沙骤起树全被砍掉了的画面。“一个人杀了十个人，你不会有太大的震惊，但只要让你看到那个人砍下一刀的情景，你就会感到可怕。”

【江艺平】消费广场、曹西弘、东白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任副总编辑江艺平回忆，20世纪90年代的南方周末报

社内，有两个人特别较真：曹西弘和鄢烈山。曹是流浪记者出身，具有赤子情怀，时任“消费广场”版编辑，当时的“消费广场”从个案入手，读者和市场的认同度最高。1997年、1998年，有关公民维权的报道惊动了信息产业部，一些被监督的企业通过各种关系施压……上面要求，这个人不能留在报社。“当时大家就跟他商量，委屈他变个名字”，曹西弘就用了“东白”作笔名。社长也装糊涂，上面问起这个人是否还在报社，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当时，江艺平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人对周末实在太珍贵了”。

【迟宇宙】过堂、笔记

1998年，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迟宇宙，来到《南方周末》当记者，第一次出差去湖南江永采访，像“过堂式”地跟县委班子聊，当时还以为“当记者、做舆论监督这么容易”。之后遭遇的挫折才让他意识到，做新闻是件很有挑战的事。从那个时候起，迟宇宙养成一种偏执的习惯：每次出去采访严格要求自己，笔录手写不少于20页、周期不少于7天……他说，“写作是我这辈子最想干的事情”。

【刘万永】“三盲”院长、200个电话、贪官

1999年，刚入行一年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去山西绛县，采访报道“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长姚晓红。“中央领导作了三次批示，第三次才派人去抓，他跑了。”刘万永找到专案组副组长、运城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采访，得知从检察院开会决定抓人到去他家抓捕期间，一共有200多个电话打给姚晓红，提醒他快点出逃。“可笑的是，他不是逃跑，而是拿着一堆获奖证书来北京找中央警卫局的人给他说情。后来，公安部门通过他手下人打电话叫他回去，才抓住了他。”当时，刘万永觉得，写篇报道就能抓个贪官，新闻还是有力量。后来才逐渐发现，好不容易喂饱了一个贪官，又来一个更贪的。

新世纪迄今

【邓飞】“潜伏”、垃圾袋

2000年，湖南大学的邓飞毕业后，去了长沙《今日女报》，之后选择到《凤凰周刊》当记者，编辑部在北京，而他的战场主要在湖南。2005年，他在家乡“潜伏”了三四个月，拿出了一篇“猛料”：关于湖南省高院院长被“双规”的文章，叫《吴振汉落马》。文章出来后，《凤凰周刊》在长沙十分畅销，平常只卖1000多本，当期增调了3000多本，都卖光了。现在，《凤凰周刊》在长沙街头的报摊几近绝迹，个别摊主卖杂志，还要用个黑色的垃圾袋包着。跟邓飞一个班学新闻的有48个，现在像他一样做调查记者的只有三四个，他说自己“善良而执著，无限忠于自己的职业和内心”。

【何华峰】茅台酒、红包、金箔

2001年，从厦门大学毕业的何华峰在英国路透社上海站当新闻助理。有一天，茅台酒开新闻发布会，给每个记者发了不少东西：一瓶茅台、一个几百块钱的红包，还有一块金箔。打电话“请示”首席记者后，把红包、金箔都给退了，酒拎回去后就放在办公室。同去的《南华早报》记者耿必儒，就没拿任何东西。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媒体的记者都拿了，在何华峰看来，“这就是差别”，而在他眼中，红包是这个圈子的潜规则，但实际上不合法。

【卢跃刚】卡迪亚、农民问题

2001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副主编卢跃刚应邀访问德国。当时，贝塔斯曼集团旗下《明镜周刊》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卡迪亚，刚奉调回汉堡，准备接任总编辑，请卢吃饭的时候，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卢，你们农村问题怎么办？”在汉堡美丽的湖畔，一个西方记者问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她说，中国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在卢跃刚看来，“这个问题是个重大问题，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记者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即使农村孩子自己也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中青报农村出身的孩子就不研究，他们的记忆里，对有些东西是强制性排除的。”

【南香红】三峡、文明、新疆人

2002年，《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接到任务，去做三峡的报道，要出思想。“我在北京就买了很多的书，到了成都又和专家谈、看书，很厚，几十本都有。”她当时想，报道不能局限在三峡工程本身，而要了解长江文明、蜀文明、楚文明、吴越文明，把三峡串起来看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更关注历史的东西，到成都后，还去了三星堆，它可能和三峡关系不大，但我觉得这个文明出现在那里有它的道理，所以去那儿看。”稿子记录了一些城市因为三峡工程而“死亡”的最后瞬间。后来，去中国人民大学作演讲，有个家在三峡的学生说，看了报道之后就哭，文章至今仍然保留着。南香红是新疆人，对历史、文化、生态关注比较多。

【李海鹏】梦、才力、上校

2003年5月31日，在辽宁省体院当门卫的前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由于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先是意识丧失，随后心脏停跳。《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去采访，才力母亲商玉馥说，凌晨4点布谷鸟刚叫起来的时候，她梦见儿子喊：“妈呀，妈呀，你给我蒸俩肉馅包子吧，给那俩人吃。”这个梦一下让李海鹏想到了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跟那个被国家抛弃的上校一样，那种孤独感噩梦般的感觉一直充斥在小说里。”于是，他在《举重冠军之死》的特稿开头，就写了才力母亲的这个梦。“我只是知道一种方法写一个梦，然后噩梦的感觉和孤独感就在整篇报道里弥漫开来，就把那种调子定了，就把宿命感建立起来了。”

【沈亚川】21 世纪环球报道、停刊、黄金时代

2003 年 3 月,《21 世纪环球报道》突然停刊,上海站的同事们心事重重,主编赶紧在内部 BBS 上安民告示:各位同人无须惊慌。记者沈亚川感觉,停刊的过程犹如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里说的,“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没人说这个报纸吊销刊号了,也没有人说要立即解雇大家,报纸虽然停止出版,但南方集团还继续给记者发工资。“这种有点古怪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到 CCTV《社会记录》任编导的沈亚川在一篇回忆帖《追忆〈21 世纪环球报道〉》里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大家感觉梦一下子醒了,却还心有不甘,坊间却已经开始嘲笑我们还在围着已然死去的报纸“奸尸”。

【唐建光】李思仪、女记者、停职

2003 年,成都有个叫李思仪的 4 岁小孩,单身的母亲吸毒,有一天出门,把她锁在家里,困了约一星期。邻居听到孩子哭,报警叫警察去救,但警察没去,结果小思仪饿死了。事情引起轰动,当地一个女记者最早报道此事,消息稿刚出来就被当地封杀。此后,她在网络发了报道,之后受到停职处分。《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唐建光在访谈中说:“对记者来讲,这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事,但对这种不可不报的事情,你必须把它报道出来。”

【卢跃刚】南都案、王克勤、联名信

2003 年,发生“南都案”,《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被抓起来。针对此事,首都新闻记者要写联名信,《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起草完以后,请《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改,“改完后让我签名,他认为我当然会签。我写了封回信说,本人反对签名,不签。”不签名的理由是:尚未对这个事情作过起码的调查,怎么有资格来进行判断和干预呢?在他看来,大学老师可以签,可以根据文本来表达态度,而调查记者没有这种资格。卢跃刚准备了一笔基金,想组织三五个人来作一次系统调查,调查后来确定案件的性质,然后再进行发动……最终,事情流产了,“一些参加声援的记者关键时候躲了”。

【李菁】高耀洁、裹小脚

2003 年年底,《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去河南采访“年度人物”、中国著名的民间防艾人士高耀洁。她在高家采访,连续三天,早上去晚上回,真正跟采访对象生活在一起。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李菁发现这位老太太“非常不可亲”,对丈夫不够关心,又遭到子女抱怨。“正是因为特别需要全心投入事业,所以她才在生活中显得那么不近人情。”她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高耀洁原来是裹小脚的,裹了一段时间又给放了。后来,这篇报道《人道主义者高耀洁》的导语是这样的:“这双小脚曾是旧世界的一个象征,但在这一刻,高耀洁,这位勇敢的老人,却成了中国民间抗击新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新灾难——艾滋病的伟大象征。”一个细节,把

一位英雄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我们身边的人”。

【朱玉】早产儿、卫生部、中华医学会

2004年元月，新华社记者朱玉写了一篇关于早产儿氧中毒失明情况的稿子，叫《一千零四十小时》。大年三十，她抱了一摞资料跑到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办公室，把资料放到桌子上，对他说：“这些早产儿没有一个是我的孩子，也没有我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是你的孩子，但既然材料到了你的手里，拜托你好好看一看，咱们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后来，领导作出批示，春节以后，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联合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出台了一个早产儿用氧指南……朱玉说：“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在意稿子的影响力。”

【李鸿谷】马加爵、三重世界

2004年2月，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加爵杀害了4个同学后出逃，一个月后在海南三亚落网。《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李鸿谷派记者去广西、云南采访其家人、班主任。在现场，记者打电话给他，介绍了采访到的素材，他脑子里就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一个18岁之前活动半径没有超过10公里的农村孩子，从广西的一个偏远地方到了云南省会城市后，整个人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学的人生跟他高中的人生是不同的世界，已经有地理学的“两重世界”，大学时期又迷恋网络，如果把网络理解成没有边界的地域的话，就建构了一个“三重世界”。李鸿谷笑着对笔者说，三联喜欢搞“造词运动”，制造词语、制造话语，“三重世界”这个概念就是三联制造的，可以让读者对马加爵有准确记忆或印象。

【沈伟】观众质疑、食品安全、三优

2004年，CCTV《每周质量报告》主编沈伟和他的同事陆续接到一些观众的质疑，反映揭露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的“黑幕”少了。实际上，由于大量暴露食品领域的阴暗面，对一些企业、地方政府监督部门压力比较大，有关部门建议栏目组宣传一下当时提出的“三优”（优秀企业、优良品牌、优质产品）。“这对我们节目本身的生存也有好处，对老百姓消费也有个引导，并且很多都是出口产品，对国家形象也有好处……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接受了建议。”其实，很多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始终身处两难境地：看节目之后，感觉啥都不能吃，深感生活缺乏安全感；不看节目又憋得慌，感觉十分不过瘾。

【赵世龙】《新周报》、阅评、知音集团

2004年年底，时任《新周报》主编赵世龙“手松了下”，在第三期报纸中发了一篇评论，提到党内三权分立的问题。上头的阅评意见认为“此提法不妥”，报纸的主管单位知音集团“吓坏了”，后来，赵决定退出，“必须为《新周报》付出代价”。离开武汉坐火车去北京，路上，网上有帖子出来，标题叫“谁逼走了赵世龙”，里面说赵世龙是硬汉记者，肯定遭遇到了压力，不然不会走的，“还说我黯

然离开江城去北京工作了”，其实，他是去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搞的舆论监督研讨会。

【刘畅】胡劲草、唐山大地震、圈子

2006年，适逢唐山大地震30周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发短消息问CCTV《新闻调查》执行制片人胡劲草去唐山采访的感受如何。收到回复的短信，内容很悲凉：“历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了，我们最近的唐山节目让所有人遍体鳞伤。”刘畅回短信，这样写道：“历史被真实记录，需要让记录者付出艰辛和代价，值此特殊的纪念一日，以同行的相互温暖和问候，积蓄支撑我们前行的心灵力量。”差不多从2003年起，北京的一些调查记者之间的联络多起来，“大家没事通个电话，每年春节必吃一顿饭”。小圈子建立起来以后，确实让大伙感到相互支援的温暖力量。

前言：启蒙与监督的变奏

——中国深度报道实践轨迹的回望与浅思 001

导读：这些人，那些事，我们的时代

——30 年深度报道碎片史 001

第一篇 启蒙的回响

有悲悯之心，但以专业为标准

——《中国青年报》“冰点”原副主编卢跃刚访谈 002

真相不足，需要通过报告文学来弥补/专业主义意识的觉醒，是一夜之间的事/大学新闻教育的问题在于躲避问题/坚守的前提，是要有能耐、能抗打击/记者是什么？是一种生活方式/“深度”是最后呈现的结果，而不是形态/我只想做个好记者，没有别的要求/我们的精神结构，是现代化情境下的西方主义/有悲悯之心，但不以悲悯为标准

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今天

——《中国青年报》“冰点”原主编李大同访谈 029

新闻就是要披露全部真相/特稿不仅要告知，还要审美/我的编辑方针就是八个字/《冰点》的报酬很不合理/理想的状况是《冰点》独立发行/越是灰色带的新闻越可能是本质的新闻/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群人/获得真相的过程，主要是获得证据

坚守内心忠诚，这是职业化的底色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访谈 042

我的长处不在管理，而是对常识的认同/监督和启蒙是并存甚至并重的/90 年代的记者更具悲悯情怀/南都报面临两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二篇 监督的困惑

新闻满足我对社会的无数好奇

——新华社主任记者朱玉访谈 054

没有分裂是因为心态比较平和/即便是记录者，本质上还是想影响/每个人都一直在谋求突破

在体制边际做舆论监督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访谈 063

应该把舆论监督看宽泛点/《焦点访谈》走到现行体制能容纳的边际/只能有多大的笼屉蒸多大的馒头/感觉费很大劲，真正起的作用不大

我们的意义在于满足知情权

——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主编沈伟访谈 073

定位并非舆论监督，而是生活服务/监督企业比监督政府更难一些/报道会让整个行业和消费者受益/它是真正按照新闻规律在做报道

知道得少，就懵懂地活着

——《南方周末》原副主编方进玉访谈 085

做新闻，很多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新闻的记录和影响功能，都要承担/成为悲情英雄也实在没有办法/在尽可能的空间里，把真相告诉老百姓

第三篇 调查的逻辑

求解案件事实背后的逻辑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编委沈亚川访谈

..... 096

这种尝试不会威胁到精神和肉体/不管怎么喧嚣，基本原则不会突破/媒体要按

职业原则来引导公众情绪/媒体没有做出佘祥林案的任何真相/希望读者从节目中得到事实中的逻辑

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访谈 111

既关注“物施人”，更要关注“法施人”/看过黑暗与悲惨，让自己纯净起来/媒体的公信来自自我意识的完善/自由和理想是最宝贵的精神元素/突然成名带来慌张的感觉/我是一个偶然、例外、另类者

总有一种声音把我们呼唤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崔丽访谈 129

困惑来自我们的新闻传统与现实的冲撞/职业记者要接近、追寻新闻规律/法制报道更具有改变社会的价值/一定不要带主观结论去判断/嗅出“山雨欲来”的新闻味道/独家采访马加爵，挖掘他的社会意义/内心的新闻冲动，很容易被唤醒

逼近真相的过程充满乐趣

——《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编刘万永访谈 148

无论这件事多荒唐，都有内在逻辑/这个案子里，大量人扮演着不同角色/标题有点软，但很契合、很有回味/与人斗智斗勇，是很有乐趣的事/你要为别人呼吁，否则也没人给你呼吁/官方的评价和“江湖”上的评价是不同的

好的商业报道都是调查性的

——《环球企业家》主编杨福访谈 164

企业和人是我们报道的重点/必须培养媒体独立的姿态/我们强调记者情感上的零度取向/我们的核心，在于关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做正常的事情，这就是归属感

——《凤凰周刊》资深记者邓飞访谈 175

《凤凰周刊》的存在可以优化行业结构/任何事情，悲观绝望都不是件好事/媒